

以供给侧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黄承梁

供给侧改革是以着力改善供给体系供给效率和质量、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步调整 and 平衡为目标,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结构、增长动力结构的新逻辑、新战略、新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笔者认为,下大力气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系统性难题,科学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给力绿色发展,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补短板、去产能、提效率、强保障,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人民享有供给侧改革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红利。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供给侧改革

现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重点,首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结构优化促使整体经济转型升级,打造生态、低碳、绿色、增值、高效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这已形成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也必然成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在产业结构上,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尤其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积极构建现代技术及其产业体系,以技术创新引领和推动新一代节能环保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浩浩荡荡之大势。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都迈上了新台阶。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正面临一次绿色经济的巨大变革,以生态技术、循环利用技术、清洁能源等为代表趋势的科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绿色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性要素,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在纷纷抢占绿色发展的新高地。我们要走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路子,其核心思想就是绿色发展。要改变传统要素投入结构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的现象,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 and 途径。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增长动力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创新逐渐成为主要动力。供给侧结构改革要主动适应和推进动力结构调整,再也不能拼人力、拼资源、拼生命。要主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新机遇,突破一些革命性关键核心技术,进而带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以供给侧改革的强大动力把科技创新的潜力和动力释放出来,大力推进和促进增长动力调整。

把握生态文明建设供给侧改革战略任务

坚持做加法,补短板、强产品,扩大有效供给。可以说,生态产品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以生态产品品种多样、服务品质提升为导向,增加清洁空气、洁净饮水等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质量的有效供给。同时使绿色消费向节能环保器具、绿色家电等有利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商品和服务拓展。从根本上说,要按照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战略指导思想,持续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持续推进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扩大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生态产品供给创造更大的时空环境。

坚持做减法,去产能、调结构,减少无效供给。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化解产能过剩。供给结构不改善,就必须加大生产要素投入,进而降低经济的运行效率,造成需求不足,浪费严重,资源环境难以承受。坚持做减法,要抑制旧产业、旧业态的供给需求,加快资源从传统三高两低行业的退出速度,要主动承受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阵痛。

坚持做乘法,增要素、提效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个科学论断为根本遵循。要善于做乘法,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的要素,不断为优质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自然生态系统空间,培育经济增长的乘数因子,使生态环境供给侧改革发挥倍数效应,使新产业以几何式增长推动经济发展。

坚持做除法,禁红线、强保障,寻求最大公约数。维护我国生态环境空间的整体功效和系统安全,要从红线划定既是底线,也是上限。要红给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出发,着眼于发挥制度供给保障优势,继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自然资源用途管制、资源有偿使用等制度,增强自然生态服务功能区整体建设,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明确资

推动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落地生根

吴舜泽

今年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审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这一草案首次写入PM_{2.5}等环境质量指标。纲要草案提出,今后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3%、15%、18%,森林覆盖率

达到23.04%,还提出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80%、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比例超过70%等目标。大气、水两类环境质量指标首次纳入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约束性指标,这是一个重大信号,具有划时代特殊意义,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与方向的战略调整,指明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与方向。当前,要深刻理解、认真领会,并以此指导“十三五”生态环保工作。

环境质量纳入约束性指标符合环境治理的客观规律,是我国发展观的重大创新,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战略性意义。

国际环境治理进程表明,大规模污染物排放量控制之后应转向环境质量目标控制。以日本为例,1955年前日本致力于污染源排放强度控制,1956年~1991年逐步过渡到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强度并重,1992年后确定为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幅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量,上世纪90年代起转向以降低主要污染物浓度为导向的治理氮氧化物和VOC综合治理,用25年~3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我国自“九五”实施总量控制,“十一五”起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约束性控制,经过十余年大工程、大治理的不懈努力,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4项重点污染物的浓度进一步下降,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这为环境质量管理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必须加强形势预判,把握规律,尽早、主动地改革转型,调整战略重点,围绕提高环境质量这一核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环境管理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提升。

从规划、整治、征服自然到约束人的行为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必须以环境质量目标约束性控制为抓手推动落实。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发展硬、保护软,GDP考核的指挥棒导向作用过强,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绿色

◆蒋高明

目前,我国“三农”问题出现的新动向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农民脱贫压力巨大,但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农业多采取粗放经营方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不仅污染了乡村环境,而且污染了食物链,城乡居民健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家付出了高昂的治理成本。

如何让农民劳动有合理回报?如何将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破解农村贫困、消除乡村环境污染的系统解决方案。

高效生态农业的优势

第一,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应当以生态农业为主。我国平均每人拥有耕地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50%。由于现行的农业模式种地不挣钱,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抛弃,转而依赖化肥、农药、农膜、

相关链接

全国人大代表刘嘉坤建议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精准扶贫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委书记刘嘉坤在两会上提出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精准扶贫的建议。

高效生态农业指的是在尽量少使用或基本不使用化学投入物的前提下,保证作物产量基本不下降甚至高产。刘嘉坤认为,大力发展新型高效生态农业,不仅可以破解农村贫困、消除乡村

发展理念提出的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的要求,必须通过落实环境质量约束性要求来实现。约束性环境质量指标没有完成,GDP等预期性指标再抢眼也缺乏底色。“十三五”期间,资源环境民生方面的约束性指标数量增加、分量加重、占比提高,具体体现和落实了绿色发展理念,有利于全社会更好地统筹发展与保护、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更加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将生态环保由以往的制约因素转变为推动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对环境质量目标进行约束性控制,表明了国家提高环境质量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体现了民心所向。

约束性指标属政府职责,代表着更多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公共服务承诺。我国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将目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实现;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共利益领域对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是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必须实现、必须完成的指标,具有强烈的国家意志。

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的提出,代表了政府向社会、向人民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标志着政府从关注提供服务过渡到服务结果本身。治污减排是服务,是手段,而把环境质量即治污减排的结果作为目标,标志着政府环境管理思路与定位的重大转变。

环境质量纳入约束性指标体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要求,体现质量倒逼。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对全国尺度、大范围、多要素环境质量改善程度提出明确要求,就是从稳中趋好、变局部改善为总体性改善,这就要求做到改善领域要全面、改善程度要明显、改善成果要惠及大多数群众。具体而言,“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基本要

求是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不能退步;基本表现是主要环境质量指标有所好转,一些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大的突出环境问题(如雾霾、城市黑臭水体)等得到基本解决,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一些代表性区域率先达标。对环境质量实施约束性控制,就是在具体指标上落实总体改善要求,表明了党和政府提高环境质量的决心,是向污染宣战的战役目标导向。

环境质量指标具有可评价性和可感知属性,可以满足全面小康社会的环境要求,符合老百姓环境期盼。群众关注的主要是环境治理的结果而非过程,要主动适应这种社会公众诉求。应该看到,具有效果评价意义的环境质量指标的提出,使“生态环境总体改善”总体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抓出一批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受益的环境治理成果。

环境质量纳入约束性指标只是一个起步,更重要的是有约束、有商有量地强化落实地方政府负责的刚性要求,构建环境质量管理体系的机制体制政策制度体系。

一是构建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目标管理模式。“十三五”期间,生态环保目标设计上要体现《规划纲要》中环境质量的刚性约束要求,建立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指标体系。在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研究编制的同时,就要同步考虑水、气的约束性指标的落地、落实、落细问题。实施质量目标的年度和省市分解,实现可监测、可分解、可统计、可评估、可考核。要兼顾2015年基数、气象水文边界条件的变化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将“国家与社会公开约定”的各项质量改善约束性目标落实到各省、各区域、各流域、各城市、各控制单元,形成约束性的目标目标集。目前不少省市并没有将环境质量纳入约束性控制,重点流域、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74个城市外的不少地方,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的基础相对比较薄弱,需要大力推动。

二是上下结合实施环境质量管理清单式管理。与过去的总量目标较多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不同,由于我国环境质量具有区域分化的特征,因此,提高环境质量工作具有差异性和自下而上的特征。“十三五”期间,要“上下协商互动”,以“好差两头”、“大小并重”、远

以高效生态农业为突破口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于10%,全部加起来不到6万亿元。如果有1亿个城市家庭每年消费3万元优质农产品,即可带动1亿个农村家庭从事安全农业生产,全国近50%的人口吃上安全放心的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优质农产品回报高,可带动农民就业,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真正实现先富带后富。另外,优质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将有很大竞争力。

第三,释放城市人群的消费力,帮助政府扶贫,促进城乡和谐。药食同源,只有食物健康,人体才健康。优质安全食品是有很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可带动健康产业发力。目前市民对优质农产品购买的力量并没有释放出来。传统农业在GDP中的比例小于10%,全部加起来不到6万亿元。如果有1亿个城市家庭每年消费3万元优质农产品,即可带动1亿个农村家庭从事安全农业生产,全国近50%的人口吃上安全放心的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优质农产品回报高,可带动农民就业,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真正实现先富带后富。另外,优质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将有很大竞争力。

第四,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健康。优质食品生产对生态环境有严格的要求,水、土、空气都不能污染,从源头杜绝了化肥、农药等。这样可以通过市场作用倒逼工厂生产有害化学物质,帮助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农业还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耕地固碳。中国科学院的实验数据证明,将传统的农业模式改为有机农业模式,可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逆转为净吸收,其强度可达11.5吨二氧化碳当量/年/公顷。

第五,避免农产品滞销与餐桌浪费,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农产品滞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是农民在市场经济面前没有定价权,盲目生产造成大量宝贵自然资源及人的劳动力严重浪费。在这样的农业模式下,富者返贫,贫者愈贫。利用互联网+,高效生态农业实现的是某种程度上的计划经济,农民能销售多少就种多少。这样可以避免农产品滞销与餐桌浪费,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建议

分析高效生态农业优势,建议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利用中央涉农补贴、各项扶贫资金和环保资金,释放城市与农村两方面的活力,科学引领资本下乡,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首先,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解决农民就业与脱贫。围绕种植、养殖、加工与销售等环节,增加生态就业机会。中国涉农与环保方面的资金,即健康保障、社会服务的资金应向广大农村倾斜,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盘活农村市场。

其次,将人类吃的粮食与动物饲料粮分开,分类生产口粮与饲料粮。对于口粮和主要经济作物,在水热资源较好的传统农业地区,采取精耕细作的办法,即生态农业的办法生产,达到国家要求的有机标准或至少绿色食品标准。提高优质健康无农残粮食与食品附加值,释放城市人群的消费力,全民动员解决吃得饱、吃得好问题。

第三,保护城市消费人群的知情权,将有机和绿色认证机构收回国有。当前有机认证和绿色认证为公司行为,权威性大打折扣。城市人群对认证的信任度低,购买潜力被压制。建议将全部农产品有机认证机构收回国有,严格对健康和生态环境把关。

第四,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试验示范区。按照先试先行的原则,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议以县为单位,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以严谨的科学数据和事实来说话,以计划+市场行为带动粮食安全问题解决,避免政策上“一刀切”现象。建议国家购买农业、健康和环境保护服务,发挥国家涉农、节能环保、涉健康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国家资金应向环境友好型、粮食保障性、就业扶贫型的高效生态农业倾斜,鼓励固氮、固碳、化肥、农药、农膜减量型农业。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